

中国古典文学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二輯

083



中國書畫出版社

李苦禪畫集

第一冊



中国古典文學
厚古薄今批判集

第二輯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3號

民族印刷廠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號928 字數65,000 開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張 $3 \frac{3}{4}$ 插頁4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冊

定價(4) 0.38元

出版說明

毛主席在《介紹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里面这样說：“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龔自珍詩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

現在这部批判集，主要就是大字报的选集，絕大部分是学生批判老师的，小部分受了老师錯誤影响的学生的自我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老师的錯誤更有力的批判。批判的是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当中的严重的厚古薄今傾向。这个傾向实际上就是古典文学教学研究領域里面的资本主义道路。

古典文学教学研究領域里面，资产阶级的白旗造成了“万馬齐瘖”的沉悶局面。大字报的风雷一鼓蕩，果然就把沉悶空气一扫而空。白旗被拔掉的地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紅旗正在插上去。文学艺术方面群众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大字报同样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只要有无产阶级的党的领导，群众就可以做出一切神奇的事情。现在开始的这场斗争，必将锻炼出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千千万万大字报的作者当中，将来一定会涌现出很多很多红色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无产阶级才是一切人类文化优良遗产的合法继承者，也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创造者！

这里选的大字报的批判，都是针对一种倾向，不是针对什么人。这是希望读者了解的。

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1958. 7. 13.

目 录

科学研究中的资本主义白旗

.....南开大学 奔 向 (1)

厚古者的真相《人民南开》(6)

“厚古薄今”十論.....天津师大中文系党总支 (12)

厚古薄今使我陷入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

.....南开大学(未署名) (20)

先生,你把我引向何处?

.....南开大学中三(3)班 庞清閣 (25)

我要从故紙堆里解放出来

.....南开大学中三(3)班 韓靜琳 (30)

我受到的毒害.....南开大学 陈之品 (34)

老师們的资产阶级教学观点对我们的

影响.....南开大学(未署名) (35)

一場大論战

.....天津师大中二丙班 郭文瑞 田开德 (41)

张先生在教学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	南开大学中二(1)班、中二(3)班	(46)
此路不通	南开大学青年教师、研究生	(50)
向許先生献礼	南开大学中三(1)班	(57)
关于王先生教学中的若干問題		
.....	南开大学青年教师、研究生	(66)
王先生在教学中究竟宣传了些什么		
东西	南开大学中三(2)班	(80)
孟先生在教学中的厚古薄今傾向及		
其他	南开大学中三(3)班	(88)
王先生应正視自己教学中的主要		
缺点	南开大学中四	(99)
陈先生在教学上存在的严重問題		
.....	南开大学(未署名)	(105)
从顧老对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及其作品的		
分析看顧老的文艺观点		
.....	天津师大中专二丙班 吳兰亭	(110)

科学研究中的资本主义白旗

——記中文系展覽会科学研究部分

南开大学 奔 向

中文系教学改革展覽会科学研究館，以大量的事实証明了，在过去科学研究这个陣地上仍然插着白旗，严重的脫离政治，脫离实际；一些教师走着白专的道路，把知識据为私有。迷信材料，抱残守缺，狂妄自大，“清高”；鑽冷門，厚古薄今；只講单干，不發揮集体的作用。因此，中文系这些年来科学研究工作的成績是不大的。

“为科学而科学”虛伪的資产階級濫調，早已被揭穿了。但是馬先生，至今仍然認為封建社会的文人作學問是超功利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他在給一年級同学上“古代汉語”时宣称：“我們講古代汉語，即不从文学角度出发，也不从历史角度出发，而是从語法角度出发。”这不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在“选材”的过程中，馬先生是有自己的選擇标准的，階級的傾向是不可能掩飾的。試举一

例：当馬先生講《信陵君列傳》時，對信陵君“禮賢下士”大加贊賞，對“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甚為推崇。其原因何在？馬先生不會在黨群關係問題上提出過“單相思”的論調嗎？只恨沒有信陵君那樣的人“親枉車駕”“往數請之”，只恨自己這塊“美玉”“世鮮能知”，而感到遺憾。

“為學術而學術”“為科學而科學”的口號只能是欺人的謊言而已，政治是擺脫不了的，為誰研究，為何研究？這是試金石，沒有什麼“超功利”“超階級”的道路可走。

二

馬克思說：“科學不應當是一種自私的娛樂，凡是幸運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應該是第一個用他們的知識為人類服務的人。”（《回憶馬克思恩格斯》）而我們有些教師他們把知識攬為己有，把它作為自己爬向名利高峰，留下“身後名”的梯子，他們忘掉了自己的知識是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創造的精神財富。如有一次，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編輯，曾輾轉向許先生尋求了幾個《水滸傳》的注解，當《水滸傳》出版後，許先生卻郁郁不樂，覺得自己費了心血研究出的成績，輕而易舉的被別人發表了，得到的

不过是一本《水浒传》而已。*又如《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一些个别的注解，許先生本来認為不容易注出的，可是当別人注出来便感到驚訝，他們怎么能考証出来呢？于是感到自己的鑽研白費了，苦恼，惴惴不安。这难道是一个人民教师所应有的感情嗎？这些也充分說明我們有些教师的灵魂深处仍然是一个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王国。許先生說“我搞出的东西好坏都是我自己的，由我負責”，这就更証明了許先生知識私有觀念的牢固，忘掉了自己生活的是——社会主义时代，忘記了自己对祖国的責任。

馬先生在科学研究中有一些創造性的見解，但不願拿出来，如“古代漢語”不願拿出新的注解，怕別人“偷”走研究成果。一个科学工作者應該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拿出来，格拉塞曾这样写道：“馬克思是先将他理論上的任何成就，将他一切重大发现都向群众、向无产階級传播。”在我們的社会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何尝談到“偷”呢？它只能促进科学的繁荣、进步；我們誠懇地希望老師們，摆脱这种肮脏的念头，把自己从“名缰利索”中解放出来。許先生不是留下一本永垂不朽的著作、留下“身后名”嗎？

* 作家出版社于一九五三年出版七十一回《水浒传》的修訂本，改正原来注释数百条，其中有几条，採納了許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对旧本批評中的部分意見。修訂本出版后，出版社曾寄贈許先生一部，表示接受了他的批評，并希望再提意見。这是当时的事实經過。

——本書編者按。

这和“一本書主义”的思想实質又有何区别呢？“一本書主义”已被人唾弃了，只有从“名缰利索”中解放出来，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有益的贡献。

三

在科学研究中严重的脱离实际，鑽冷門，鑽在故紙堆中，不知浪費了多少精力，白白消耗了多少時間。研究的成果可以說毫无用处。如宋先生本来是搞現代漢語的，偏偏对佛經有兴趣，鑽了几年，讀了足有上百本的佛經，把佛經的篇名術語背得烂熟，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許多語法問題单靠佛經得到解决。又如宋先生的《变文筆記两則》(1957年《南大学学报》)，只不过从《道藏》給孙楷第先生关于押座文和法师都講座起方向的解释找出旁証而已，証明押座文使听众收斂心神，証明講佛法的和尚起坐的方向不論东南西北，試問这样的論文又有多大用处呢？它离开实际是那样的遙远，写了又有誰看？《神会語录的語法研究》、《兒女英雄传的語法研究》、《白話語法及其历史》，也是这样的情况。馬先生花了許多時間去研究甲骨文，而把具有现实意义的“連字句”的研究放下来。馬先生說：并不是对甲骨文有多大兴趣，只因为这門科学是冷門，搞的人很少，研究出来容易見成果。当1955年語言学界进行主語和宾語討論时，馬先生認為“参加討論的人很

多，自己的意見不一定能引起重視，很難討論出個所以然來，與和大家爭論，不如搞別的”。我們不难看出：老師們把研究看成個人的事業，他們把集體利益擲在一邊，而為所欲為，清高自恃，為了自己的名，就有意逃避現實，而去搞那些所謂“高深”的學問，即落個學識淵博的美名，又穩座“釣魚船”，名利雙收，一箭雙雕。這種從個人出發的研究態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學中的教師應持的勞動態度。這種做法必然給集體事業帶來危害。如語言教研組曾提出文學語言研究的方向，馬先生宋先生卻曾表示懷疑，信心不足，而執意去搞自己那一套，迷信自己的材料，個人的才能，如今正是共產主義大協作的時代，如果再單槍匹馬干下去，那將是窮途末路。多少事實證明，集體協作是發展科學事業的有效措施，這是集體智慧，集體主義精神的勝利。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科學研究態度是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列寧說：“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事業不但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的工具，而且它永遠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我們的口號：

必須拔掉科學研究陣地的白旗，把紅旗插遍一切思想領域。

厚古者的真相

《人民南开》

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厚古薄今”傾向，不仅是一个治学方法問題，也不单是一个認識方法問題，更主要的还是一个思想問題和立場問題。

但有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却不以此說法为然，他們装出一副“清高”的模樣，声言自己的厚古只是“为学术而学术”，或是从什么“兴趣”出发，有一点“癖好”而已。至于真相，他們总是遮遮掩掩不肯說出口的。

究竟什么是“厚古”者的真相？且讓我們用一部分事实来作証。这事实还仅仅是从一个中文系的展覽会上見到的。

資產階級名利思想，是一些教授、學者們鑽故紙堆、找冷門、热衷于繁瑣考証的基本动机。例如一位任教現代漢語語法学的教师，对現代漢語中的种种急迫問題頗为冷淡，而对古代的語言倒十分有兴趣去鑽，原来他是这么想的：現代漢語大家都懂，研究它显不出自己高明，搞古代的就可以炫耀自己，抬高自己。

为了追逐名利，有些先生們也并非象表面上装出的

那种勤于治学精神的人。从有利于自己出发，往往避难就易，舍远求近。例如馬先生对于1955年語言学界热烈爭論的主語賓語問題，本来是有自己看法的，但是他不顧现实的需要，而热衷自己的甲骨文研究，为一字一句煞費苦心，为解释“义京”两字而大做文章。原来他認為，参加爭論的人太多，自己意見不一定能引起別人重視，爭論的問題又很复杂，不易弄出个所以然来，“与其和大家爭論，不如另搞別的”。宋先生則認為，搞現代東西提出自己看法，容易被人駁倒，搞古代的東西可以愛怎麼說就怎麼說，“既不愁別人挑剔，又落得學問高深美名。”果然，宋先生科學研究主要內容就在《神會語錄》和“變文”之類東西了。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主要研究的只是为关于押座文的解释作旁証，証明講佛經的和尚起坐方向不固定这一毫无意义的事。

也是为了求名得利，某些先生找到了繁瑣考証这一条門徑。例如王先生虽也学了些馬列主义，但自己認為靠不住，容易碰实际的釘子，还是多考証一些，那既容易办，又有名利。于是講班固非追查到他的祖宗七、八代不可。在乐府民歌的講义中，屬於考証的篇章竟比屬於作品分析的还要多。王先生還會单为相和清商的曲詞問題，写了整整有一两千字的文章去闡发，虽然这对人們接受乐府遗产关系很小，但只要它能在大刊物上发表，名利有了就达到了目的了。

逃避现实，不能与时代精神合拍，而将感情寄托到古人身上去，特别是从那些没落阶级颓废思想中去找寻所谓精神安慰，这是另一些先生们的厚古的重要缘由。有些先生眷恋过去剥削阶级生活方式，哀伤自己剥削家庭的死亡，对现实不满。例如王先生对于反映地主悠闲生活的作品倾心赞叹。黄庭坚的“喚客煎茶山店远，看人获稻午风凉”，被王先生认为是清新的，读起来便觉得“空灵超脱”的诗，其实这不正好反映了王先生本人对反动阶级生活的留恋吗？这位过去曾在反动政权中充任过要职的王先生，读起李清照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来，表现出自己无限哀怨的情绪，这不正是与没落阶级的文人精神合拍的表现吗？

教现代汉语的宋先生，所用例句大多数都是《儿女英雄传》上的，因为用现代作品为例，势必要读这些书不可，而这就要使他接近他所不大愿意接触的现实生活了，这位先生对于现实竟如此害怕，而乐意整年整月地鑽到佛经里面去，据说他读佛经足有百本以上，篇名术语被他背得烂熟，这些除了说明宋先生甘于与死人为伍，厌弃现实生活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某些先生抱着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不放，对旧的统治者的感情远胜于对人民大众事业，他们替那些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们的流露的是惋惜、同情、感叹，有一位老先生念到李煜的《虞美人》的最后一句时，竟情不自禁地

由哀伤而表现出“眼圈兒都紅了”。王先生对于《古詩十九首》中的文人消极頹废思想給予极大的称贊，說他們“品質高洁”，連“人生寄一世，淹忽若鷗尘”也被肯定了。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也認為沒有絲毫消极成分，是“雄才壮志”的反映。

追求和欣賞古典作品中的庸俗、落后、甚至是低級趣味的糟粕部分，也是某些先生“厚古”的兴趣所在。他們对那些思想性强的东西，往往不感兴趣，干巴巴地說上几句，一遇到那些庸俗落后的东西，便有声有色津津乐道起来了。例如王先生对岳飞和陆游的詞远不如对秦觀詞的某些庸俗东西的有兴致，他沒有批判地描述着“奴如飞絮，郎如流水”，“怎得花香深处，作个蜂兒抱”，“帘兒下，时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这类低級趣味的东西。右派份子朱一玄在講《水滸》的着眼点几乎放到潘金蓮、潘巧云、閻婆惜等人身上去了，令人驚訝的是，单是講述閻婆惜的出身、喪父、結婚、私通等所用的時間竟比講林冲、李逵、武松、魯智深等形象用的時間还多些。王先生講授時間尽管很紧，一篇作品往往三言兩語帶过，但对文人們的腐爛生活，諸如“裸体喝酒，以屋为褲”之类东西都不輕易放过。华先生花极大功夫去考証《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細節也是一样。朱先生尽管可以用几分鐘時間講述苏联文学的几部名著，但是都决不省略木罗式加、黛莎的性生活的詳解。有些先生們在現代思想性强的作品中既然